

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

刘志云 (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博士生)

[内容提要]晚近国际经济立法的勃兴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和国际关系理论背景,本文试对后者进行探讨。文章首先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经济法的关系进行简要概述;再对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对晚近国际经济立法产生的重大影响,做出深入探析;最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立法的进一步发展趋势。

[关键词]新自由制度主义 国际经济法 相互依存 法理主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冲破民族国家之间设置的市场篱笆并构建全球市场秩序体系之需求日强。在此背景下,国际经济立法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显然是促进这一发展的重要原因。

一、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经济法的关系

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几乎都局限于国际政治领域,如理想主义关注的是世界和平,现实主义关注的是所谓的“高级政治”,等等。相应地,这些理论所影响的国际法主要局限于国际公法领域,而对于国际经济立法的影响更多是间接性的,表现为国际经济立法常常被当作意识形态或军事对抗的工具,或国际政治斗争的附属品,缺乏应有的独立性。

随着国际经济迅猛发展,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日趋密切,“经济利益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市场开始主导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服从并受制于经济利益”^①。由此,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对“低级政治”予以关注。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军事对抗的紧张状态得到一定的缓解,国际经济合作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并成为当代占据主流学派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这些理论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方法对晚近国际经济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两大流派在国家安全

以及经济福利方面的观点分野,它们对国际经济立法的影响程度也有着根本差异。

与摩索根现实主义相比,新现实主义理论更加重视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经济关系,具体表现在:(1)为“低级政治”正名,认为世界虽然处于无政府状态,但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的增强,大大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关系。^②因此,国际合作(尤其是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手段之一即国际经济立法,必须得到重视;(2)开始寻求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的密切联系,提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只有将政治与经济关系结合,才能正确研究国际关系。^③但是,新现实主义理论从根本上仍将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看作是“极”的世界,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时代,因此为国家安全需要,可以牺牲经济福利。这种理论对国际经济立法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甚至会产生不良影响或阻碍作用。如新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过分渲染政治色彩,认为“政治因素导致经济后果”^④。如此,经济政策与法律便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或产物,无论是赞成低关税还是提倡贸易保护主义,或是主张投资自由化,都是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

^① Thomas Fr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pp. 10-15.

^②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2 页。

^③ 同上书,第 122 页。

^④ 关于“政治因素导致经济后果”的论述,详见 John Spero,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Third Edition, St. Martin's Press, 1985, Preface, pp. 1-19.

针对新现实主义的观点与研究方法,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提出了不同的国际体系研究模式。新自由制度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假设,崇尚“放任自由”原则,即“如果任由人们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遵循它们的自然倾向,就会自动产生对人类与物质资源做最合理的运用。这不仅就国际贸易来说为真,而且放诸四海皆准”。^①引申到国际关系领域,其含义是,只要各相关行为体都安守本分、相互尊重,国际政治的前景必然乐观。^②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自由主义流派认为,在政治经济社会活动和分析单位中,个人是主要行为者;而个人是理性的功利主义者;个人实现其特定的功利靠的是自由贸易。该流派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1)政府在政治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其主要职能是为市场提供必要的保障和基础;(2)需要建立国际机制来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③也就是说,国际经济合作不仅要求各国在国内建立保障与促进市场运作的经济法制,而且应该以自由化为核心,消除国别间的制度障碍,实现全球资源市场优化配置和全球市场的效益与稳定。这些显然是晚近国际经济立法所追求的目标和内容。

对比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当前国际体系的主要概念、国际关系的主要角色、国际行为的主要动机,以及比较两大流派所用的理论、观点、证明的来源和手段等等^④,我们可以看出,前者主要关注国家安全问题,后者则注重政治经济的研究,而两者的研究方法呈互补关系。鲍德温认为,“传统意义上,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并不被看作相互的对立面。一般来说,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是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这一术语更多是用于国内政治而非国际政治层面。除了最近关于自由民主与产生战争之间关系的讨论以外,在国际关系中,自由主义这一术语很多时候是用于国际经济层面”^⑤。可见,新现实主义是以权力利益和安全为主体的思想体系,其研究角度主要是在国际政治领域,对国际公法的建构产生重大影响;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则是以国际合作、相互依存为主体思想体系,适合解释政治经济问题,对国际经济立法影响重大。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对国际经济立法的影响

如前所述,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与国际经济法的联系更为密切,其一些重要的理论概念与分析方法对国际经济立法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一,对合作中获取绝对利益的关注影响到国际经济立法“零和博弈”状态的改变。国家合作是为获取某种利益,利益分配决定合作成败。当国家关心的是相对利益,即计算自己所得是否多于别人所获,则属“零和博弈”,少有合作的余地。现实主义的观点正立足于此。^⑥而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作为理性的自我主义的国家更多的是关注本身的获益,而不关注其他伙伴是否获益、获益多少或者这种获益多于或少于本国获益,合作的主要限制在于欺诈。^⑦由于大部分经济活动相当透明,且行为者可以彼此监督、相互协调,所以,欺诈很少直接导致致命的后果,因而减少了合作危险。^⑧现实中,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这种观点对改变国际经济立法的“零和博弈”状态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由于冷战思维与意识形态之争,超级大国或东西方国家之间更注重相对利益,害怕合作的利益分配使对方实力增强而导致安全威胁,这种思维限制着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利用经济限制与制裁手段成为它们的惯用工具;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占据主流地位的“发展理论”或“依附理论”,对原有的“国际分工体系”、“国际贸易体制”和跨国公司强烈敌视,无论是跨国公司的资本

① 洛克著:《政府论》(下篇),转引自王杰主编:《国际机制论》,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5 页。

② 王杰主编:《国际机制论》,第 65 页。

③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 356 页。

④ 有关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当前国际体系的主要概念、国际关系的主要角色、国际行为的主要动机以及所用的理论、观点、证明的来源和手段的比较,可参阅:Ole Holsti,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alist and Neoliberalist Perspectives o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Charles Kegley and Eugene Wotkoff (eds.), *The Global Agenda -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1995, p. 136.

⑤ 大卫·A·鲍德温:“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和世界政治”,大卫·A·鲍德温主编,肖欢荣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 页。

⑥ 参阅肯尼思·沃尔兹著,胡少华等译:《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35 页。

⑦ 约瑟夫·M·格里科:“无政府状态和合作的限度:对最近自由制度主义的现实主义评论”,大卫·A·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第 125 页。

⑧ 参见查尔斯·利普森:“经济和安全事务领域的国际合作”,大卫·A·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第 74-75 页。

输出,还是 GATT 的贸易谈判,都被视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剥削与奴役的工具。于是,脱离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成为发展中国家内外政策的目标。由此,东西方与南北方关于国际经济立法的谈判更多地陷入“零和博弈”的泥潭。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只有 65 个国家签订了 170 余个双边投资条约,而且多局限于发达国家之间。^① GATT 前七轮谈判也局限于关税减让的少数领域,发展中国家参与的积极性低下。在联大会议上,南方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试图以“权威体系”取代现存的经济体系。^②

至 20 世纪 80 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在政治上的对抗与意识形态之争渐趋缓和,国力的竞争转到经济领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发展经济的压力,解决公民的生存与福利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这时,新自由制度主义重视绝对利益的观点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各国在对待跨国公司准入和国际贸易合作问题上,将是否对己方有利作为最重要的判断标准,“双赢”成为流行口号。而一旦国家对相对获益的关注减少,它们将参加十分持久的、有着明确的规则和组织的制度。^③ 事实上,近年来加入原有的国际经济制度如《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GATT 等的国家数量成倍增长;各国积极参与新的国际经济制度的创建,如《多边投资担保公约》、WTO 等;GATT 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一揽子协议是二战以来国际经济自由化立法的最重大成就。

第二,经济利益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各国对国际经济立法的重视。国家利益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它源于国家主权,既然国家主权至高无上,国家利益自然就成为国家的最高目标,是国家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④ 在现实主义眼中,国家利益的内涵包括: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文化完整等,^⑤ 而经济利益不是重要构成因素。因此,国际经济法制的合作与建立或维护各国的军事联盟或政治联盟相比较,显然不是很重要,国际经济合作的利益期望时常成为军事或政治竞争的牺牲品。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东西方紧张局势的逐步缓解与消除,经济利益开始成为国家利益的最根本的方面,“市场力量

正在取代国家权力特别是政治和军事权力而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⑥。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开始把促进人民的经济福利与幸福纳入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并构成国家核心价值和最基本的对外政策目标。^⑦ 这种认识上的变化无疑提升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于开展经济全球合作与推动国际经济立法的重视程度。

市场经济的天然扩张本性决定国内市场必然需要突破国界的制约,消除妨碍资源全球优化配置与生产力发展的篱笆是国际经济自由化立法的任务。但当国家关注的核心仍是权力、安全和生存问题时,国际经济立法就会举步维艰,且有偏离市场目标的危险。与新现实主义不同的是,新自由制度主义更强调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认为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至少是同等重要,而且经济利益显然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⑧ 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各国为促进生产力发展而制定符合世界市场统一趋势的国际经济规则便成为欲求之目标,拆除各种不利于经济自由化的法律壁垒成为晚近国际经济规则谈判的主要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美式双边投资协定”还是“欧式双边投资协定”,都是为国际直接投资的自由流动扫清障碍;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东盟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皆是致力于本区域的贸易、投资的自由流通;而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了包括在传统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投资措施等方面的自由化协定,对拆除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的各种壁垒起到了巨大作用。

第三,全球相互依存理念明确了国际经济立法的必要性。相互依存是工业革命以来逐渐发展的现实,只是在晚近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这种特征愈发

① K·J·范德费尔德:“美国双边投资条约:第二次浪潮”,《密执安国际法杂志》,1993 年第 14 期,第 635 页。

② 斯蒂芬·D·克莱斯勒著,李中华译:《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 页。

③ 罗伯特·基欧汉:“制度理论和冷战后时代现实主义的挑战”,大卫·A·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第 279 页。

④ 俞正梁:“试论国家利益的复合两重性”,任晓编:《国际关系理论新视野》,长征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9 页。

⑤ See Hans Morgenthau,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6:961, 1988.

⑥ 丁志刚:“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的认证与维护”,《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 年第 8 期,第 69 页。

⑦ See Frederic S. Pearson and J. Martin Roches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98, pp.177-178.

⑧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 129-130 页。

明显。新现实主义对相互依存的概念尚持保留态度,^①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则把它视为安身立命之本。在它看来,虽然相互依存并不意味着行为者的利益处于和谐状态,或权力关系已不重要,但其蕴藏着和谐或合作的广泛性,因为一方实现其目标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他各方可能做出的选择或决策,所有的行为者都必须为中断这种关系付出代价;^②这样,这个世界“被看作存在广泛的劳动分工、各个部分体现不同作用、各部分之间存在互补利益的状态,每一方都从这种依存状况获益”^③;当共同利益增大时,国家将愿意接受持久的、有明确的规则和制度的安排。^④

承认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的现实是推动各国参与国际经济机制构建的重要基础。这是因为:(1)国际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与矛盾的增强需要法制来有效解决或缓解;(2)共同利益的维护要求“互惠”,“国际机制虽然不能代替互惠,但它们可以强化并使互惠制度化,制度结合互惠的规则,使背叛失去合理性并因此而付出更多的代价”^⑤;(3)相互依存的推动来自包括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多方面,多元行为主体的共同参与拓展了国际经济立法的活力与视野;(4)国际经济制度在运作中必须使参与各方都能从中获益,这是相互依存的客观要求,否则这种制度不可能真正为国际社会接受并发挥规范国际经济秩序的功能。^⑥

显然,相互依存理念促使南北双方重新审视彼此在世界市场上的相互影响。发达国家开始重视与发展中国的经济合作,积极将后者纳入国际经济谈判进程,并在谈判中放宽了让步的“容忍度”;发展中国家也逐渐意识到独立于世界市场之外或再建一个世界市场是不可能也是不理智的,要解决本国人民生存与发展问题必须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各国对参与国际市场及构建国际市场秩序的看法的改变,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经济自由化立法的发展。原先南北双方在国有化、市场准入、投资待遇、自然资源永久主权、争端解决等方面的对峙得到了重大缓解,南北双方的纷争实现了从“是否自由化”的根本分歧到“自由化快慢”的技术性分歧的“质变”,即由“对抗”转向“合作”。

第四,国际机制的法理主义精神加速晚近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制化步伐。国际机制的概念于 1970

年始于政治经济学分析,反映了国际关系学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透明度、可靠性、责任性、一致性、非武力等为其基本要素。^⑦尽管学者们对于国际机制的内涵尚有分歧,^⑧但都认为国际法是其主要或核心部分。事实上,由于法律所具有的稳定性、可预测性及权威性功能,晚近国际机制的发展趋势明显是从非正式机制向正式机制过渡,法理主义是其重要导向,国际机制的建设进入法制化阶段。法理主义观念的兴起推动了国际关系的规范化和有序化,也为国际经济立法提供了合理性与合法性依据。具体表现在:(1)各国在一个经济相互依存的世界,协调利益分配、缓解冲突和促进共同发展需要一个相对统一并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国际性经济法律和规则;^⑨(2)法理主义的基本宗旨和核心内涵是国际关系的规范化、国际机制的有效性。^⑩在处理全球性、区域性或双边性的国际经济问题时,则体现在具有一定的强制约束力或“软法”性质的一系列准则、规则、宣言和决策程序上,它们经由国家接受而对其行为发挥一定的强制力或道义约束力;(3)法理主义在实践中强调各国对跨国经济问题的平等参与和共同责任;(4)法理主义在国际经济领域的目标是实现国际经济关系的有序化和国家经济行为的规范化,增强国际经济合作的安全与可预见。从效率的角度讲,法制化的国际经济合作能够降低信息成本、界定权利边界和监督制裁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经济交易费用等,这无疑符合经济全球化对建构全球市

① 肯尼思·沃尔兹著,胡少华等译:《国际政治理论》,第 193 页。

② 海伦·米尔纳:“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无政府状态”,大卫·A·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第 165 页。

③ 海伦·米尔纳:“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无政府状态”,大卫·A·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第 166 页。

④ 罗伯特·基欧汉:“制度理论和冷战后时代现实主义的挑战”,大卫·A·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第 279 页。

⑤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罗伯特·基欧汉:“无政府状态下的战略和制度合作”,大卫·A·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第 110 页。

⑥ 刘杰著:《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机制的秩序重构》,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0 页。

⑦ See Stanley Hoffmann, *Janus and Minerva: Essay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estview Press, 1987, p. 144, 411.

⑧ See Stephan Haggard and Beth A. Simmon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1987, p. 495; Donald Puchala and Raymond Hopkins, “International Regimes: Lessons From Inductiv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1982, p. 248; Stephen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1982, p. 186.

⑨ 只不过它并不追求国内法那种绝对权威,仅与参与国的接受和遵从为限,但晚近国际经济自由化立法的发展却表明,国际经济法律正在不断地寻求与增强权威性,如强化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

⑩ 刘杰著:《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机制的秩序重构》,第 93 - 94 页。

场秩序的需求。晚近国际经济自由化立法的勃兴体现了这种建构过程。至 1998 年底,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总数已达 1726 个,2/3 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签订的,涉及的国家增加到 174 个。至 1997 年底,已有 178 个国家与地区签订了 1794 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① 在同一时期,区域的或多边的自由化协议也成倍涌现。国际经济关系正在朝法制化阶段发展。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国际经济立法的发展趋势

究其实质,国际经济自由化立法的勃兴是资本与市场全球扩张的结果,后者是前者建构的根本驱动所在,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在这个建构过程中,无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资本扩张与市场膨胀是无止尽的,它们需要一个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毫无分割以及真正统一的全球自由市场体系。从这个角度看,现有立法成就只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雏形或起点。另一方面,冷战后的国际环境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实践提供了一种“良性土壤”,决定其仍然有着进一步发挥作用的可能,它对国际经济立法的影响也将进一步加深。

事实上,WTO 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涉及贸易、金融、投资、竞争等,触角伸及国际经济的各个领域)的启动,标志着国际经济法律自由化进程将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然,随着谈判议题的扩大,各方的分歧和矛盾将进一步加剧,谈判进程会愈发艰难和缓慢。首先,南北矛盾的处理正确与否仍然是立法的成败关键,在这方面,《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失败与《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谈判成功提供了一反一正两方面的经验。GATS 所构建的“锁定”(standstill)制度、“逐步回归”(rollback)的方法和“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② 有可能得到更广泛的运用,从而使越来越多的涉及南北方的国际经济关系进入法制化阶段。其次,在经济全球化、自由化与一体化逐步加深的背景下,存在潜在或现实冲突的现有国际经济规则将出现整合趋势,包括贸易、投资、金融、竞争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法律规则的整合,以及 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经济机构职能的“内部协调”,目标在于减少冲突、相互交融、紧密联系,使国际

经济自由化立法进入更高层次的一体化阶段。^③ 最后,传统上强制力较弱的国际经济规范,不能满足国际市场主体对经济活动的安全与可预测性的需求,为解决此问题的 WTO 争端解决机制应运而生。晚近发达国家极力把投资、环境、知识产权及一些社会议题等传统上由其他国际条约或国际组织管辖的领域纳入 WTO 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希望 WTO 争端解决机制能给它们带来强制力。无疑,随着 WTO 谈判的不断深入和管辖范围的扩大,由其规则所构建的全球自由市场秩序体系将朝稳定与权威方向发展。

然而,必须引起注意的是,在国际经济立法的自由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弱肉强食”法则不仅没得到矫正,反而进一步强化。而新自由制度主义机制理论本身在道义性方面并没有发挥积极作用。^④ 相应地,这种缺陷也对晚近国际经济自由化立法产生一些不良后果或趋势。一方面,立法明显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未能充分考虑与经济发展伴生的社会问题,如劳工问题、环保问题、生态问题的解决之道,经济增长与社会问题的冲突加剧;另一方面,立法一味追求“规则平等”,忽视南北双方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悬殊。近年兴起的反全球化与反国际经济法律自由化的运动,即是以上矛盾的反映。从目前的立法趋势看,解决上述问题无疑是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首先,为解决经济增长与社会问题的冲突,劳工、环保、人权、反腐败等社会议题已经或即将进入国际经济立法的视野,因为从理论上讲,国际经济法

① 联合国跨国公司与投资委员会:《1998 年世界投资报告》(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7 页。

② 在国际经济自由化立法的谈判中,“锁定”制度是指要求缔约方作出保证,对条约中有关自由化义务的保留不得进一步扩大与深化;“逐步回归”是指缔约方在作出保留的同时,应承诺通过各种途径逐步减少直至消除暂时保留的反自由化措施,使其最终回归到条约原定的标准义务;“棘轮效应”是指每一次取消所保留的措施之后,一概不得恢复,并应成为下次“逐步回归”的起点,如此“只进不退”,使缔约方踏上自由化的不归路。有关此方面的详细论述以及 MAI 与 GATS 谈判的特点、经验和影响的阐述,参见徐崇利:“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条约谈判方式的创新”,《比较法研究》,2001 年第 3 期,第 68-71 页。

③ 有关国际经济法的“内部整合”,即一体化的讨论,可参阅:Picciotto, “Linkag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ulation: the Antinomies of the Draft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19, 1998; Ahn, “Linkages betwee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nd Trade Institutions - IMF, World Bank and WTO”,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 34, 2000; 徐崇利:“经济一体化与当代国际经济法的发展”,《法律科学》,2002 年第 5 期。

④ 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 and World Order: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al Theory”, in Ken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pp. 224-248. 转引自王杰主编,《国际机制论》,第 124 页。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ed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05.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57, 60.

律规范体现国际道德和公正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实行国际经济立法和国际社会立法的联结。^①1993年,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同时,美、加、墨三国签署的《北美劳工合作协议》与《北美环保合作协议》也即生效;近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开始加入有关人权和消除腐败等方面要求;世界银行也重新审视其宗旨,并将有关环保措施和劳工标准引入其业务;至目前,WTO既定的或拟议中的与贸易有关的社会议题已包括了环境措施、劳工标准、公众健康、竞争政策及反对商业贿赂,等等。^②

其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一步拉大南北双方的差距,众多发展中国家日益贫困化、边缘化,国际经济立法目标从“形式公平”转向“实质公平”提上日程。诚然,国际经济立法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南北双方在实力上的差距无异是阻碍博弈结果向“实质公平”过渡的难题。但是,1998年MAI的谈判失败表明,忽略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与立场的做法并不可取。在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上,南方国家集体的力量迫使北方国家启动新一轮自由化立法谈判的计划的失败,表明南方国家的利益与声音并不是微不足道。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相互依存理论角度讲,发达国家应承担起促进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更大责任,即要使发展中国家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立法,就必须充分考虑它们的特殊利益。在2001年,WTO多哈会议对新一轮多边谈判的成功启动就是明证。与西雅图会议不同的是,多哈会议所涉及的包括促进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公众健康、人力资源建设、外债问题的解决及金融稳定等议题,都与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最后,消除国际经济立法程序中的“民主赤字”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事实上,在晚近国际经济立法中,无论是经济增长与社会问题的冲突,还是发展中国家利益难以得到体现等问题,都与谈判过程中缺少民主性紧密相关。^③1998年MAI谈判的失败以及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的失败,凸现了改革现有谈判模式的必要性。具体而言,在谈判的国内层次,越来越难以把知情权与参与权限定于特殊的社会集团内部;^④在谈判的国际层次,改变现有国际经济组织的决策机制,给予欠发达国家以及“跨国市民社会”更多的参与机会。实际上,包括WTO在内的重要国际经济组织已开始考虑或着手

这方面的改革。^⑤WTO在其部长会议中积极吸纳非政府组织与会的做法就是一个较好的尝试;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欧共体、美洲国家组织、世界银行等,也已通过决议、指南等方式制定了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和参与规则。^⑥从目前情况看,虽然现有的开放度仍然不够,但修改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决策程序,改变立法“暗箱操作”的形式,增强立法的民主性与透明度,以及重视国内与全球市民社会的力量,加大和拓宽全球民众与发展中国家参与渠道和表达意见的途径等等,将是今后国际经济立法程序改革的一个任务和方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国际社会对道义的关注与全球相互依赖的加深,国际经济立法将朝更为健康与合理的方向发展。这种趋势既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如在社会议题中,重视公共健康、外债以及金融稳定等显然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提高劳工标准和促进环境保护则可能降低发展中国家出口优势或成为发达国家新的贸易壁垒。所以,在国际经济立法与社会立法的融合趋势里,发展中国家必须警惕的是,防止发达国家借机实施新的保护主义。当然,从本质讲,国际经济机制的建构仍然是一个实力博弈的过程,仍然遵循着“规则的制定者注定是规则的受益者”的法则,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在努力发展经济,增强个体博弈实力的同时,改变长期对国际经济立法置身事外的消极态度,积极参与;调整博弈策略,增强谈判技巧;协调发展中国家立场,增强整体实力。也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国际经济立法从“形式公平”向“实质公平”目标迈进。○

(责任编辑:张浩)

① 有关国际经济立法与国际社会立法的“外部联结”的讨论,可参阅:Jose E. Alvarez, "The Boundaries of the WTO: Foreword", *The American Journal International Law*, January 2002; I. S. Burn, "Linkages between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19, 1998, pp. 319-327.

② 徐崇利:“经济一体化与当代国际经济法的发展”,《法律科学》,2002年第5期,第119页。

③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杨炯译:《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22页。

④ [美]诺姆·乔姆斯基著,徐海铭、季海宏译:《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136页。

⑤ See Third World Network, "Transparency, Participation and Legitimacy of the WTO", *Third World Resurgence*, No.108/109, 1999, pp. 39-40.

⑥ 有关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立法的情况,请参阅:Saladin Al-Jurf, "Citizens, National Governments,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Development in the 1990s", *Transnational Law & Contemporary Problems*, Spring, 1999.